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敬請

政問週刊

第 六 號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

次 目

中國文化及其改造(上).....

黃文山

戰時經濟的條件及戰前應有的準備.....壽勉成

統一公債的效果.....

胡善恆

文化界與民族鬥爭.....

聖 雄

論中日關係之調整.....

馬博 廠

行發社刊週問政

定價：每期實售洋三分預定全年
五十二期連郵費壹元五角半年八
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
澳門加八角郵票十足大洋總發行
所本社代售處各地各大書局

中國文化及其改造（上）

黃文山

中國文化的改造，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現在分上下兩篇來討論，上篇分：（一）我們對於中國採取西洋文化過程之最近認識；（二）西洋文化的根本精神——經濟倫理。下篇分：（一）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家族倫理；（二）結論——中國文化的演化與轉變。

一 我們對於中國採取西洋文化的過程

之最近的認識

中西文化接觸與衝突的問題，不自今日始，遠者姑不必論，距今七十年前（一八五〇），當十九世紀中葉，歐美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思想，已到了相當成熟的時期，但中國一向是閉關自守，除掉幾千年傳下的固有文化外，對於外來的思想毫無不肖接收。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和太平軍的戰爭，實在是代表當時的一幕偉大的宗教戰爭與文化戰爭。因為當時太平軍的代表人物所信奉所標榜的是天主教，是西洋文化的遺產，這在以儒家為正統信仰的曾國藩看來是違反孔孟之道的所謂異端。曾國藩討粵匪檄很

可以代表當時士大夫階級對於西洋精神文化的態度，其大意說：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婦女而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教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賣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然。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鄭州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

字，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在高昌廟購地十七餘畝，作為製造總局的廠址。

(註一)

(註一)曾國藩詩文集，參閱蔣星德曾國藩之生平及事業，商務印書館。

這不啻是對於西洋文化侵略的一種對抗宣言！然而曾氏雖然在表面反對西洋的宗教，在實質上，他不知不覺已開始了西洋文化輸進中國的大道。他在當時以為歐西各國的富強，祇由於船堅砲利，與思想制度無關，西學除器械外無他物，所以一面要安設工廠，製造機器輪船，(註二)一面又派遣幼童出洋肄業，(註三)那裏知道前者奠定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基石，後者開始了近代的『留學制度』，成為西洋文化輸進中土的樞紐呢。

(註二)同治二年，(一八六三)間，曾國藩駐軍安徽，

便設局製造洋器。以漢人為主，未用外人，造外『黃鵠』號小輪一艘，因不得法，所以行驶很緩。于是便在同治二年冬派候補同知容閎，到美國去購買機器，有擴充的意思。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在上海買到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俊光沈保靖等，開鐵廠于虹口，容閎購運機

器到後，便併為一局，李鴻章繼之，在同治四年創江南製造總局於上海。同治六年的夏天，在高昌廟購地十七餘畝，作為製造總局的廠址。倡議派幼童出洋肄業。他們計劃：『擬率員在滬設局，逕訪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出洋，在外國肄業十五年後，按年分起，俟次回華。計回華之日，各幼童不過三十歲上下，年力方強，正可及時報效。統計費用，首尾三十年，需銀百十萬兩，然此款不必一時湊措，分析計之，每年接濟六萬兩，尚不覺其過難。』曾李提倡的留學政策，在當時並不曾深知其意義，後來學成歸國的，如詹天佑嚴復等，對於西洋文化的輸入，實有無限之貢獻。(參閱前書)

自從曾國藩的時代以來，中西文化接觸的問題，早以為用一的主張起，以至現在十教授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止，一般學者對於西洋文化所採的態度。不外通常所說

的三種：第一派主張復返中國固有文化之舊，這派可說是保守派或國粹派，第二派主張全盤受西方文化，這派可說是西化派，第三派主張分別採取，折衷至當，這派可說是本位派或折衷派。我以為建設現代中國的文化，有幾個先決的問題，第一個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究竟是什麼，我們要先了解這種根本精神才能決定我們對於西方文化應取的態度。第二個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我們對於雙方，經過一番研究，得到相當的認識之後，才可以知道中西文化的異同，才知道中西文化的長短，最後，才可以以決定我們改造中國文化及建設本位文化的步驟。

擺在眼前的，有一種極其明顯的事實，這就是：西方近幾百年來的文化系統，是資本主義的文化系統，而資本主義所以發達，所以維繫，所以存在，又因為牠有機器的文化為其基礎。我們對於現代西洋的文化，自曾國藩以後，即開始倣效，但為什麼中國一直到如今還不會真正的建立起工業資本主義制度，為什麼我們始終不停留在中古的文化領域，與西洋文化不只是量的差別，而還有質的不同？這個問題，從前已有許多學者解答過，綜括起來，大約不外幾種說法：第一說以為中國不是海上國家如英國，從其自然地理上，不能有殖民地之擴大，所以資本主義無法

發展。（註四）第二說以為西洋於經濟上不能自足，而中國能自足，無向前發展之必要。（註五）第三說以為中國無大量資本之積聚與自由出賣勞動力之多數勞動者。（註六）第四說以為中國封建制度雖已破壞，而猶有所謂封建思想封建勢力，桎梏着資本主義不能作進一步的發展。（註七）第五說以為『中國產業革命之不見，工業資本之不成，乃中國文化之早熟——不是幼稚而成熟……循夫自然之常理者，必先完成人類第一期文化，乃開始第二期文化，所謂第一期文化以人對物的問題得解決為度。第二期則為人對人的問題，顧不料數千年前之中國，當農業略有進步，商業資本初見之時，去此界尚遠，而已邁進於第二態度第二問題之途，向內而不向外，勤於作人而淡於逐物，人將物的問題，進展之機以歇，此其中重要可指之點，殆在商業資本雖有而始終不成其為商業資本主義以演進於社會，產業革命乃無由促成，產業革命工業資本之不成，社會組織結構自無由變……中國文化之所以停滯不進，社會之所以歷久不變，前面就禮俗制度本身言之，特言其一義，謂其真因乃在此。（註八）

（註四）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

（註五）梁園東，中國民族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註六)朱新繁，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各階級。

(註七)顧孟餘陶希聖等主此說，梁漱冥先生中國民

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曾引述這些說法。路子既然走不通，共產主義的路子亦屬徒然，所以他大聲疾呼：

『對西洋人及其一切把戲的認識到最後一通透點

(註八)梁漱冥，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以上諸說，大抵以後二說所提出的理由，最為近似。

梁漱冥先生是最後一說的主張者，他最近對於中國採取西洋文化的過程之觀察，與一般人的樂觀見解，全然不同。

他竟然承認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永遠不能相合，關於政治制度方面，他說：

『我已不認中國人不能運用西洋政治制度是一時的現象，我疑心中國人之與近代政治制度怕是兩個永遠不會相聯屬的東西』。

『我就於旁人不留意的地方，發見了中國民族精神和西洋政治制度間的大謬點，固然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國不能彷彿成功，亦是因許多客觀的條件的缺乏或不合。然而那不是根本的窒礙，無可設法的困難。唯獨這中國文化之邁越西洋近代文化之處，涵育得中國民族一種較高的精神，則是沒辦法的所在；中國人不能不別求政治的途徑。』

梁先生極言中國人模仿西洋文化之失敗，以為民主政治的

民族自救運動，都是為西洋把戲所騙，殊不知西洋戲法，中國人是要不上來的。而同時在認識了西洋的地方，亦能認識了自己。』

梁先生為我國分析東西文化最前進而同時亦是最深刻的一個學者，他結論，實在值得我們的注意。梁先生觀察的結語，謂中國的民族精神與西洋的精神不合，而其所以不合者，則以中國已比西洋多走上一步即是禮。禮為過去中國社會之路，亦為未來社會之路。中國人徑從過去之禮以進於最後之禮，所以中國人已超過西洋人。但據我分析的結果，我也從歷史上發見雙方的民族精神的確不合，而其所以不合者乃別有在。我覺得中國文化學者，歷史學者，社會學者從來還沒有對於這個問題加以澈底的說明，而這個問題的說明，似乎中國文化改造和建設之先決問題。茲擬對於西方文化的精神與中國文化的精神分兩方面觀察，並綜述如下：

二 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經濟倫理

我這裏所謂西方文化，指的是近代的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文化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學者不一其說。有人說是從君士坦丁的陷落（一四五三年）開始，有人說是自文藝復興開始，有人說是自宗教革命開始，有人說是自歐洲向外擴展和商業革命的時候開始，更有人說是自工業革命開始。

照我看來，近代西洋文化大抵孕育於十世紀，迄乎宗教革命，才具雛形，到了歐洲向外擴展，方進入少年期，及至工業革命已達到壯年期，現在則又由蓬蓬勃勃如火如荼的狀態，到了轉形的時期了。這千年的西洋文化，不只是文化質素的歷史的堆積，而且是一個『功能的機體』（Functional organism）——其宗教、哲學、倫理、科學、藝術、經濟、政治、法律、社會，形成了一整個，其中的各種質素，正如佛家所謂『相待如交蘆』而這些相交的水準是心理的或心理社會學的。

近代西洋文化與其他一切原始的，古代的或當代的其他文化最顯著的差異點，一言以蔽之，可曰：西洋文化是機器的文化，其他的文化是藝術的文化而已。由機器的文化，乃創造出資本主義，甚至引出簇新的社會主義，若乎

機器文化之所由生，則又由西洋人的生活態度所造成，而此生活態度，即是他們的『經濟倫理』，（註九）經濟倫理的理想，不外是相信：時間是真實的，故主張寶貴光陰；勞動是真實的，故主張努力工作；金錢是真實的，故主張勤儉生活；空間是真實的，故主張征服自然；物質是真實的；故主張一分一寸地加以量度。我們且看這種中產階級的哲學如何會產出機器的文化。

（註九）這裏所謂的『經濟倫理』相當於德國經濟史家或宗教社會學家麥克思·魏伯所謂 *Wirtschaftsethik*, 看 J. Max Weber, *Religionssoziologie, Wirtschafts- und Sozialtheorie*, Quoted 1924;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1922. 麥克思·魏伯謂世界宗教如孔教、道教、印度教、佛教、猶太教之日常生活的倫理，恰好形成了這些民族經濟的社會組織。他們的『因襲主義』和精神與『近代資本主義的精神』完全不同，這是那些國家的資本主義所以不發達的原因。（Wirtschaftsgeschichte PP. 302-315）

普通的歷史家，大抵認近代工業的大轉變，起源於瓦特 (Watt) 之發明汽機，而所謂工業革命，即指那發端於十

八世紀的系列的工業變遷，但從事實上看，西歐在工業革命以前，機器的文化，已經在過去的七八百年當中，一步一步地向前進展着了。這種機器文化，究竟在那裏形成出來的呢？牠的起源，顯然不止在一個地方。機器文明實質是許多習慣、觀念、生活樣式和技術的工具之融合(Convergence)。這種新的秩序，固然初由歐洲社會一般狀態中，表現出來，而『秩序的意志』(Will to Order)則首先表現於寺院、軍隊、錢莊、而後及於工廠，最後乃到達於一般社會。西洋人的態度早就傾向於機械的，由這種機械的趨向，然後完成複雜的機器，用牠們來表達自己的新傾向和新興趣。過去一百年的偉大的物質發明之後，決非單是技術的長期的內部發展而已；這種發展，實在有其精神的變遷在焉，所以在新的工業歷程還沒有大規模地實現以前，一切人生的想望、習慣、觀念，乃至目的底新指向之確定，實為新秩序實現絕不能缺少的質素。

舉例來說：在過去機器文化存在的七百年當中，西洋人關於時間和空間的觀念之範疇，早已經過許多卓越的變遷。他們的生活之任何方面，都受着這種觀念的轉變之影響。科學家應用數量的方法研究自然，最初表現於時間的規律之量度，而時間的新的機械概念，大部分蓋由中古寺

院之規律生活演進出來，而亦惟有在西方的寺院裏，方能發生秩序的願望。依據向來的傳說，西洋的第一個鐘鐸，係由一個和尚給爾貝(Gerbert)創造出來，給爾貝也即是十世紀末葉的西薇士德一世(Sylvester II.)教皇。寺院本來是中古有規律的新生活之重鎮，至於一個用以指示時間間隔的工具，也許就是那種生活需求的必然產品。德國經濟史家桑巴德(Sombart)謂本泥狄克特教派(Benedictine)乃是近代資本主義的最初創始者，這話也許包含極大的真實性，因為當寺院制度最發達的時期，其皈依本泥狄克特教派統治的寺院，有四萬之多，在這寺院裏面，集體的活動，當然是規律化的，而鐘鐸在這種生活當中，不只是劃一時間的方法，抑也是人們行動趨於共步的標準。(註十)

(註十)看Werner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Der Prokratrische Socialismus, Die Zukunft der Kapitalismus等書。

根據確實的紀載，近代式的鐘鐸，最初係由巴黎的芬尉克(Heinrich Von Wyck)在一三七〇年製造出來，不久以後，這種新玩藝，流行西歐，鐘樓上的大鐘，遂支配着城市的生活，使牠成為規律化。依照中古史家桑戴克(Thiordike)之說，約在一三四五年西方人已把一小時分成六

十分，一分分成六十秒。這種時間的劃分，原屬抽象的結構，後來竟成一般人行動與思想之規範。故美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其理想的代表，當推富蘭克令(Franklin)他的有名的格言說：『時間就是金錢』(Time is money)其時的人們，對於一切勞作，也要像鐘錶的運行一樣，有規矩準繩，毫釐不爽，這就是西方中產階級的人生態度與理想。

由此說來，現在工業世界的主要機器，不是汽機而是鐘錶，因為從鐘錶的發展史看，牠的確是機器的類型象徵。機器對於現代西方文化，影響最大，這種影響，宛如三種連續的潮流：

(一) 第一次的潮流，大約起源於十世紀，那時的社會制度，已經逐漸崩潰和解體，但機器則慢慢進步，在人生方面，佔着重要的位置。其時的機器如鐘錶、印刷機、風車、指南針等在早期已表現相當的成績，而其所以能如此者，一方固然由於牠們能幫助人們獲得秩序和權力，他方也由於牠們避免許多人生的實際問題——道德的、社會的——不置解答。

(二) 第二次的潮流，迴旋於中古的長期的消沈時代，進而昂揚於十八世紀。當時對於鐘工業，已有重大的改

進。社會上關於機器創造的一切觀念學，不獨樂意接受，而且為之發揚光大，與時俱進。瓦特、亞來特(Ackwright)的信徒，更企圖把牠們的觀念學，加以大眾化，希冀獲得種種的實際效果。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從前因為專力機器發展，反被遺忘了的一切道德的、社會的、政治的、哲學的問題，便從新獲得絕大的注意。

(三) 第三種潮流，今日正在奔騰澎湃，浩浩蕩蕩，有沛乎莫之能禦之勢。許多新興的力量——技術的、文化的一——在較早的時期，為機器的發展力所壓抑，動彈不得，迨至今日，這些力量，已經在各種人生的活動上，赤裸裸地表現出來。西方現代的文化，在思想上，已經傾向於一種『新綜合』(New Synthesis)，在行動上，已經傾向於一種『新共能』(New Synergy)。一個簇新的世界，照威爾士(H. G. Wells)的描寫和推測，不久便要湧現，然而牠們在今日的表現，則仍然是片段的零碎的。一種新形式的生活，也早已在進行的當中，不過直至今日，牠們仍然是支離的、不統一的、非調節的。今日的西洋，在能力方面，雖然已繼長增高，但在人生方面，其價值，實因種種的壓迫，剝喪殆盡。機器文化的創造，其目的在於求人類生命的持續與人生幸福的增高，返觀今日，結果適得其反，所以

今日西洋文化當前最大的問題，恐怕是如何重新支配機器，及如何使機器社會化的問題了。（註十一）

（註十一）看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經濟倫理已經產生了機器文化，有如上述，但假如沒有同樣的經濟倫理，資本主義也是不會產生的。資本主義乃是近代西方的一種特殊現象。近代資本主義的類型的精神，為：（一）以適當的科學的原則為根據，而加以合理的組織和管理的經濟企業；（二）私產制度之存在；（三）（為市場銷售的生產；（四）為大眾及由大眾的生產；（五）為金錢之獲得的生產；（六）對於自己的工作，抱着絕大的熱誠，而且一切工作要有相當效率，個人要盡忠職務。所謂盡忠者，不特在於把職業自身，當作一種目的，而且也把牠當作人生的主要功能。所以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以為工作不是一種偶然的事情，而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職業倫理」，因此也成為近代資本主義精神最顯著的質素。此外，資本主義的精神，其在積極方面側重的，是理性主義，功利主義，及採用各種可能的方法，鼓勵一切的創始和發明；在消極方面所絕對排斥的，是「因襲主義」（Traditionalism），是一切缺乏效率，乃至懶惰，迷信，及反理性的特質。或是由較完善和較合理的方法之觀點

，看做不合理，不完善的質素。這些都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特徵，也即是麥克思·魏伯所謂「理念的類型」（Ideal type）。

近代資本主義所包含的這些質素，從縱的方面看，與上古中古資本主義的其他形式，既然絕對不同，而從橫的方面看，舉凡在一切懶惰，迷信，無效率和缺乏合理的行為的民族當中，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也無實現之可能。

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能夠成立，固然要依靠許多的條件，例如（一）合理的資本計算和商業管理之存在；（二）生產方法之合理的使用；乃至（三）生產之合理的技術；（四）合理的法律；（五）自由勞動；（六）勞動產品之商業化的實現及其他，然而其中最重要的，還是一種合理的精神態度，一種合理的生活狀態，一種理性的經濟熱情，沒有這些，資本主義的制度是建立不牢的。

人類的這種行為和心理，究竟是什麼力量造成的呢？關於這點，麥克思·魏伯已經給我們說得很明白了。近代的資本主義，一言以蔽之，曰：起源於新教及其「經濟倫理」。近代資本主義的精神即是新教的精神，而資本主義的行為之規則與實際的倫理，亦即是新教的行為之規則與實際倫理，二者若合符節。在近代資本主義還沒有產生以

前，這種精神，早已在新教的領域裏頭，涵育成功，所以

資本主義的精神，在資本制度還未成立以前就已發生了。

(註十一)

(註十一) Weber, *Religionssoziologie*, Vol. I, pp. 30
—34, 63ff.

這種主張，在歷史上可找到許多的證明：

第一、我們對路得(Luther)、卡爾文(Calvin)及其他教領導者的生平，如稍加以分析，便知新教精神，實與資

本主義的精神相契合。新教的主張，第一在乎對於人類的生活，予以合理化；第二在乎對於世間的職業，予以極大的倫理價值；第三在乎崇拜勞動，總言之，新教以為人類止有脫離禁慾的生活，向着人間底目的進行，過着有秩序有理性的生活，才能拯救自己，因此倡導金錢的賺獲，乃是一種毫無罪過的活動。簡括一句，資本主義的精神，本質就是新教的精神，那新教精神，也就是經濟倫理。

第二、歐洲自宗教改革以後，凡在經濟上站在領袖地位的國家，(荷蘭、英國、美國)至於天主教或非新教國家，則完全處於落後的地位。新教的經濟倫理之主要功能，在乎把整個民族，施以最新的訓練，務使適應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以及養成一切用以建築近代資本主義的企業

所必須的習慣和活動的形式。

第三、這種假設，有統計的資料可資佐證。就德國論，新教人口，在經濟上比舊教人口，較為優越，較為豐裕者多。這種情形，在中國的新教徒中，也是有的，例如新教徒所舉辦的學校，乃至工商企業，其成功的百分率，總比其他各教徒所占的大。而中國的青年會，尤其是經濟倫理的一種類型的產品。

第四、在舊教的國度裏，天主教徒的富力，本來較大，但自新教徒突起，不久即奪得領導的地位，且在工商業上，亦得到較大的成就，如呼格蘭派(Huguenots)之在法，新教派(Protestants)之在奧、夸鑿派(Quakers)之在英，其在經濟的活動上，均佔着領導的地位。

由以上的推證，可見西方近代文化之精細與複雜，及其富於組織性的機械性，純然由『經濟倫理』所造成，倘使除掉這種積極的精神，西洋文化，也許立刻轉向舊時代的因襲主義的生活狀況與文化形式去了。我們止有把握著這種精神，才知道西方文化發展的歷程、動力、性質，與中國文化發展的歷程、動力、性質之差異，究竟何在。

(未完)

戰時經濟的條件及戰前應有的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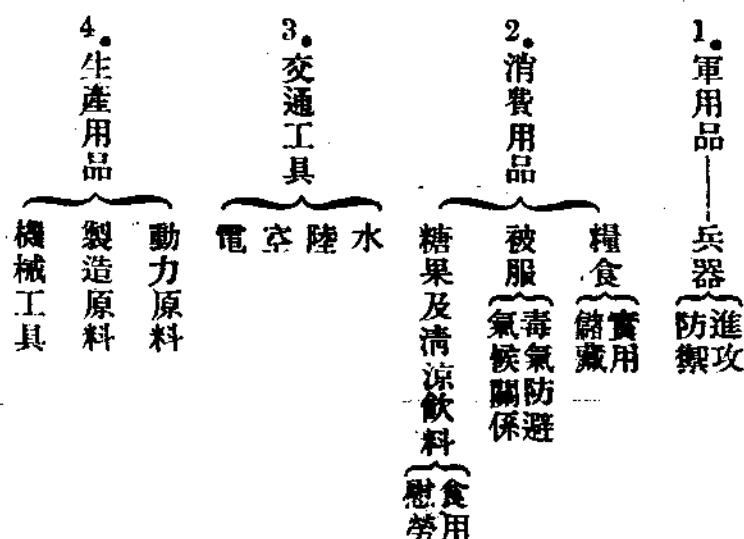
壽勉成

我希望我們以後能夠多有一點關於戰時經濟的討論，因為和平的國際關係，在現實的世界，是沒有多少希望的。而且要戰爭固然要有準備，要免除戰爭，也得要有準備，何況正惟要有戰爭的準備纔可以免除戰爭的發生。我們中國目前局勢的嚴重，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結果究竟會不會發生戰爭，雖然我們無從知道，但是蔣委長有一次在政校做紀念週曾經說過：我們要能夠把平時當作戰時看，

把戰時當作平時看，纔能夠應付裕如。因此無論戰事發生不發生，我們總是要有戰爭的準備，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對於戰時經濟的條件及戰前應有的準備都應該有相當的認識。

戰爭時期的經濟可以說有四個條件：第一是物力；第二是人力；第三是財力；第四是權力。因此戰前應有的準備也就是這四方面的準備。

一 物力



(1) 在戰事發生以後，物力的需要，就跟着激增，尤

(2) 戰時物力的需要雖大大增加，而供應的能力則反

而發生種種困難：第一（一）因為國際經濟關係的封鎖所剩者中立國關係，但軍需品亦每受破壞，而軍需品之範圍又不能確定；第二（二）因生產重要區域每為敵人所破壞或佔領；第三（三）因為勞動者中之較少壯者每應徵從軍而代以老弱，故生產效率減低；第四（四）因為交通中斷有生產而無運輸；第五（五）因為交通工具移作軍用，貨物運輸困難。但又不能不應付此激增的需要，因此就不能不用到非常的方法，一方面要用消極的方法，這就是要想法子免除上面所說的種種困難。還有就是動用平時積聚的物品。另一方面又要用積極的方法增加各項必需品的生產，這就是所謂產業總動員。產業總動員的方法可以分作幾種：第一（一）就是將民間生產設備暫時收歸公營；第二（二）就是命令民間工廠，移轉生產用途，製造戰時必需用品；如改變銀類工場製造鎗彈，漂白染料改毒瓦斯，橡皮改防毒面具，傢具改彈箱，鋼鐵改炮彈用白鋼板；第三（三）就是小工廠的合併；第四（四）就是應用物價政策，獎勵增加生產；第五（五）就是獎勵並強制非必要消費之緊縮；第六（六）就是確定優先使用秩序，至少使緊急需要不致缺乏；第七（七）就是獎勵並保護必需品之輸入；第八（八）就是民間用品的強制徵收。

（3）但是要想用這種種消極積極的方法，不是到了臨

戰的時候立刻就可以辦得到的，都要在平常的時候就有準備施行，例如敵國封鎖的方法及預防國內交通破壞時的補救方法，糧食汽油車輛等之額外積聚，民間工廠之生產設備及其所能改變之用途，這都有待於戰前精密的計劃與準備。有的時候或者還要有事前的訓練或試驗，最偉大的例子當然就是蘇俄的五年計劃，蘇俄的第一次五年計劃完全注重在重工業的建設，並且把工業分佈在全國不同的區域，這至少有一部份的目的是為應付戰爭的。日本從東京到北海道方面有很長的一條地道，並且有很多分佈在各地方的積穀倉，也有一部分是為應付戰爭的。美國對於全國某種民間工廠，有一種訓練試驗定製軍用品的辦法，於一定時期向此等工廠定製軍用品，訓練他們如何改變用途，並如何提高速度。

二 人力

（1）戰時經濟方面，對於人力的需要，無論在智力方面或體力方面，都是很大，大概戰爭時期所最需要的人可

以分作下面的幾種：

1. 戰鬥的人

2. 計劃的人

3. 做工的人

4. 看護的人

5. 擔任工商管理的人

6. 維持地方秩序的人

7. 擔任宣傳工作的人

在經濟方面有關係的，以做工的人為最感缺乏。

(2) 但是人力的需要雖然很大，而其供給則又有種種困難發生：第一、因為戰事的死亡率很高，所以許多工人要去從軍；第二、因為工廠作業改變，工作技能不能適應；第三、因為平時準備不足；第四、通貨膨脹，工人生活不能維持，或以罷工相要挾；法國歐戰時罷工一年內有多至七百次者；第五、因工人調動，運輸或發生問題；第六、因為需要太急，故非即刻集中多數的人不可；第七、因為需要的方面很多，不敷分配。

那末想什麼方法補救呢？第一、當然就是利用因戰爭而急性失業的工人；第二、是減少工作休息時間；第三、是利用婦女老幼的勞動能力；第四、是利用預備兵及俘虜等；第五、防止勞動糾紛之發生；第六、是勞動的強化（強制或引誘）；第七、是勞動技術的急性訓練；第八、是停止戰時必非需品的生產；第九、是機械的創造與使用。

(3) 但是這許多補救方法，也要靠平時有相當準備，例如技術的訓練，就要有智識的基礎，機械的發明與使用，也不是隨便可以做到的，防止糾紛也不能沒有準備，又如限制物價飛漲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價格統制，却不容易。停止某種生產工作，尤須有事前的調查。

三 財力

(1) 戰爭一定需要很大的財力，這是用不着很多解釋的。在歐洲大戰的時候，法國的戰費概算，依美金計算是五百七十一億元，德國的是六百六十六億元，平均起來，就是法國每天要戰費合美金三千五百餘萬元，德國每天戰費合美金三千九百餘萬元，就可見其數額之大了。

而且戰爭將要發生的時候，一定有許多人因為要想圖謀資本遁逃，減少通貨膨脹損失，保存錢幣價值，一定向銀行提取存款或向債務人索取款項，而款項的需要遂更大。

隱藏硬幣也是習見的事實。
物價增漲也是戰爭將要發生及發生以後的現象，物價增漲則交易所需款項更大，所以這也是財力需要增加的一個原因。

(2) 但是這許多錢從那裏來呢？我們都知道到了戰

爭發生的時候，紙幣可以停止兌現的，那末政府不是祇要叫中央銀行儘量的發行紙幣就行了嗎？我們要知道：這是不可以的，因為假使貨物的分配，還是要用到買賣與價格的方式，那末紙幣濫發，物價一定飛漲，生活費就要高得不能忍受，這不是予人民以更大的苦痛嗎？當然政府還有統制價格的方法，但是這也祇能應用於少數必需品的價格。

。然而已經很不容易，又何能望其普遍呢？所以政府當戰爭發生的時候，雖然放棄金屬本位，停止紙幣兌現，但是仍舊要想法吸收金屬防止金屬的流出，以勉強支持紙幣的購買力，但是因為發行紙幣是最輕而易舉的一個辦法，所以這個方法當然還是要用的，不過不應並不能專靠這個方法就是了。

其他的方法就是加重稅率或增設新稅，這裏面的困難就是立法及行政上的手續太複雜，不免有緩不濟急之譏，而且有的稅收——如關稅及非必需品之營業稅——因經濟封鎖及生產統制，必然減少，加重稅率，亦復無益。

不過，有的租稅富有伸縮性，是可以增加的。如所得稅是。必需品的營業稅或交易稅，當然還是可以收的。此外，還有戰時特殊利得稅，那是可以增設的，此不但為收入計，亦所以為公平計也。而且課稅以籌戰費有緊縮消費

，強迫勤勞，抑低物價，及不遺累後代負擔等利益，所以還是不失為充實財力的一個方法。

第三種籌款的方法，就是借債，在戰爭的時候，因為愛國心的關係自然可以發行相當的公債，而且富有財產的人，當然覺得公債的方法對於他們較課稅為有利益，所以比較之下，亦樂於承受，此外還可以向國外發行，譬如在向國外購買軍需品時，或可以戰時公債支付之。此外的方法尚多，不及一一列舉。

但是我們要應用這各種方法，又非有戰前的準備不可，譬如紙幣發行，應該早就想法子集中於國家銀行，現金亦復如是，所得稅亦不能到戰爭開始以後纔舉辦起來，金屬本位放棄後，匯價必即起極大變動，究竟如何維持，亦非預先準備不可。

四 權力

(1) 最後講到權力的需要，我們從上面看下來已經可以明白了。我在上面不是已經講過消費的支配與勞動的統制嗎？我也講到過物價的統制，又講到過發行的集中，匯價的維持，經濟的封鎖以及勞動糾紛的防止。試問要是政府沒有充實的權力，那裏做得到這些事情。

(2) 但是這種權力怎麼能夠取得呢？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要有具體的計劃與嚴密的組織。

現在各國担负這種計劃與組織的就是經濟參謀本部，或類似的機關，這種機關，大概包含有關係各政府機關的長官各業勞資代表及專門家。

我們仔細想想我們中國的準備怎樣？我們所有的準備

一定會使我們寒心，我們有一個資源委員會的組織，這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機關，但是裏面的工作，似乎並不如何緊張，蔣院長最近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我認為也可以看作戰時經濟準備的初步工作。我希望資源委員會的工作能夠緊張起來，並且希望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能夠積極的進展。

統一公債之效果

胡善恆

近半月來，若真若假，引起市場風潮之內債掉換，竟爾實現。

據昨日持券人公會發表宣言所稱，為發行統一公債十四萬六千萬元，用以掉換現存之三十餘種公債庫券憑證之類，又發行復興公債三萬四千萬元，以「充平衡收支，充實金融準備，扶助生產建設，及撥存平準債市基金」等事項之用，兩共十八萬萬元。數額之大，調換範圍之廣，可謂空前。

此次內債掉換，在財政措施上，為實行法幣之又一驚偉舉動，自不待言，其效果如何，吾人試加以推論。

一、可以減少最近期間之償債費 本來國家負債加大時，應當增多賦稅收入，清償國債，以免國債所引起經濟

財政上之不良影響。但在我國現時財政，情形特殊，急於償債，其害反大。國家償債之費，若出自賦稅收入，方為真正減債。我國近十餘年來，賦稅收入不充實，每年輒賴舉債，彌補不足，是國家無償債能力，其理至明。現存公債庫券之償還條件，為定期定額之制，不容變更，毫無伸縮，即或賦稅收入不夠償付，亦必發行新債，償還舊債。舊債之償還照面額，新債之發行僅六七折不等，是每年償還一萬萬元之舊債本金者，若全出於舉債，則須發行新債一萬六千萬元，方夠償付，國債負額，乃逐年累積加大。現存內債負額之十四萬萬餘元，大部分皆從此種強制償還累積而來，納稅人負擔此累積增加之債務者，真是極大之冤枉。此次調換統一公債，可以減少每年之還本費

，國家與人民，從借債還債所蒙受之損失，得以減少一部分。

二 可以平衡預算 近數年來，預算不足，賴舉債以彌補。平衡預算之法，當於減少支出增加收入兩方面設法。以支出而論，軍政各費，皆極緊縮，雖不無可以節撙之處，而在現行政制之下，其能裁減者，為數究微。至於收入，各種現行稅收，正在力加整理，年有增加，新稅之施行，又有層層阻礙存在。財政概情如此，長此下去，則預算之破痕加大。債務費在預算中為數甚大，單以公債與庫券兩項之還本部分計算，在二十一年為六千餘萬元，十二年近八千萬元，二十三年為九千萬元，二十四年預計為九千六百萬元，而此各年度預算不敷，賴舉債以為彌補之數，約與此等數相等。是內債延緩還本之後，每年預算，當可入於平衡。在最近將來，預算固不必完全適合，而有重須舉債之事，但預算不足之數，必比不延本者為少，則可斷言。

三 可望增多建設費 我國財政之最大缺點，為收入支出，俱無彈性，收入只夠供應經常支出，政府只能維持存在，各種建設事業，皆以經費困難，不能舉辦。在此種情形之下，國勢固瀕於險境，而國民生活，亦陷於莫可振拔。我國將來經濟之發展，從事實看來，有不能取法於歐美各國者。各國國民資本之發達較早，有穩固之組織，在國際間又占優勢，許多社會建設事業，國民可以負起責任。是以我國各種基本產業，咸須待國家直接經營，其由人民自由經營者，亦須國家給與財力之援助。國家既負有此等建設事業之責任，財政更須力謀充裕。此後國債事務減少，建設事業費方有增多之可能。

上述三點，是為國家財政之利益，但此利益，只在最近數年之間，而還本期之延長，國債之付息費加多，是反增重國家之負擔，將來還本又必增重財政上之困難。凡此種種，是為國家之損失。以我國現情而論，財政如此困難，國家如此阽危，有不能不於此時，充實財力，作為各種設備者，至將來負擔之增重，亦惟待將來解決而已。從持券人之立場看來，此時掉換，利息如前未減少，未受何損失。惟還本之期延長，從前每月每季可以領還本金之一部份者，此後改為每半年抽籤一次，且每次抽籤之數減少，是持券人不免蒙受貼利減少（即市價與面額差價）之損失。但此項貼利，究為不正當之利得，從納稅人之立

場以觀，不能任其存在。若欲加以掃除，必須引用收買償還法，以代替現行之抽籤法，關於此點，暫置不論。至於持券人之利益，可從此掉換獲取者，常為一般人所忽視，不可不加以說明。

持券人之持券，認為最可憂慮者，莫如債券市價之漲落無定，每遇風聲，則紛紛出賣，誠恐價格更跌，蒙受更大之損失，以此對於公債之投資，視為畏途。此次掉換，亦有穩定公債市價之處：

一、可以調劑債券之供需 現存三十餘種內債債券，各有其條件之不同，各有其存在數額之不同，以此各有其供需情形之不同。在存在額較少者，易啓輒轉之風，往往因某一種債券之輒轉，遂引起他種債券之風潮，此種情形，在我國債券市場，數見不鮮。此次統一各種公債庫券，條件整齊，市場上只有償還期不同之公債，無復種類岐異，存在債額不齊之債券，債券之在市場，成為簡單化與標準化。一般人民既容易了解公債之條件，無須考察各種公債之各別規定，或抉擇其利益之大小，是可以增加人民對於公債投資之興趣。債券之需要，若能因此加大，是可以提高市價，在持券人為有利益。又從前各種債券，形成為各種市場，彼此各有漲跌，統一之後，撤除各別市場之藩籬

，打成一片，成為一個市場。供給與需要，從前分屬於各個市場者，今則齊立於一個市場之上，雙方之數額加大，彼此買賣之機會較多，此適合買賣雙方情形之市價，亦有維持悠久之力，當可免除市價之突起鶻落。

二、可以堅定國債信用 債券市價，常依國債信用之好壞而變動。在私債信用，有擔保品存在，債權人可以處置，以維護其利益。至於國債，雖可由國家以國有財產或稅收為担保，但人民決無權加以處分，持券人所恃以為担保者，乃在國家有償還債務之誠意與能力，以獲得人民之信心而已。國家債債之誠意，見於嚴守發行條件，按期償付本息，而其能力，則見於稅收之充實，預算之嚴格遵行，行政之整飭，每年有剩餘可供償債。兩者相較，債債能力，究為根本之物；國家雖有誠意，倘無能力，亦無從維持國信也。考之我國國債情形，外債部分，尙未能減少，自外匯穩定之後，外債之償還費，比從前加巨。內債部分，每月須付本息至一千五百餘萬元。關稅收入，除償付此內外債之外幾無餘存。（二十四年關稅收入為三萬一千萬，關務費占三千一百餘萬，實收僅二萬八千萬，償債費約三萬萬元，是不敷之數，為二千萬以上，）鹽稅等稅收入，必須留供軍政費之用，不能再挪充債務基金。是我國每

年償付三萬萬餘元之債務費，可謂遠超過事實上所具之能力，長此下去，政府為事實所迫，有不能顧全信用按期償付者矣。假使一旦有愆付或停付之事發生，債券市價勢必陡跌，結果仍是持券人蒙受損失。故此次掉換內債，雖為變更原定條件，不免引起持券人之疑懼，但政府為量力償債，或可以保全國債信用於將來。在持券人只要新訂條件能按照實行，亦可以避免債價陡跌之損失，此為雙方顧全之法，不能以捨棄國信目之也。

二月三日夜

文化界與民族鬥爭

聖雄

一九三六年已經到臨了。世界帝國主義與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之矛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矛盾，都市畸形發展與農村破產之矛盾，在在足以使今年成為一個人間世最大的難關。在世界，全世界已經到了大戰的前夕，在中國，中國的民族生存鬥爭，也已到了大戰的前夕了！

全中國的文化界，實際上已教着「最後一課」，事實擺在目前，誰能否認，這不是我們民族最危險的關頭？我們有數千年「成仁取義」的文化信條，我們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遺訓，我們能率四萬萬民族，做亡國的順民麼？

我們能伈伈倪倪在幾條重的壓迫之下，日日講禮義廉恥，日日默誦「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老死相」的經典，那麼？不！我們全中國的文化界，為中國民族的生存計，當然要流到最後的一點血，來保衛我們的國土，來維持我們民族的生命線。

北平文化界的領袖，馬敘倫，白鶴飛，崔通伯，張申甫先生等，為響應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已於日前發起組織北平文化救國會，並發表宣言（見北平晨報），該會通電，尤其值得全國人民的注意，茲錄原文於次：

此次掉換，只於減輕國家暫時之償債負擔，此外尙待建樹之事甚多。如：國債消化量，當從各方面加以擴張；設立減債基金，以代替現在之國債基金，採用收買法，以代替抽籤法，充實中央信託局之職責，集中各種公款，專用以控制債券市價，使之於穩定；設立登記公債，以代替證券公債，使一部國債，得以固定化；減少外債之償付，取消庚子賠款，諸如此類，皆極重要，當於他日論之。

全國各報館、各通訊社、各文化團體、救國團體公鑒，所謂三原則，其精神與內容均為徹底殖民地化我全國之基礎綱領，承認三原則，不但正式斷送我北部十餘省，縱敵騎蹂躪我全部領土，必且斬絕我民族生存，使我人民永淪於奴隸厄運，無論政府已否接受

，或接受其個別具體細目，我人民自身決誓死反對，一二八紀念日。

我們對於這個電報，除表示完全一致外，更無別話可說。報載政府對於所謂「三原則」，已經不予承認，但文化界自身，仍應一致奮起，喚醒整個民族，作大戰前夕的準備。我們的意見，是很簡單，分開來說，不外是：

一 現代的戰爭，乃是民族與民族的鬥爭，在這種戰

爭中，每一個人都要有各自的功能，每個人尤其要有充份的鬥爭知識與準備。如何能使全體人民都能具有這種準備，這是今日文化界的神聖使命。

二 民族的鬪爭的勝負，固然決諸於疆場，但假使國人到了戰時，即發生絕大的恐慌，如「一二八」之役，公務人員的偷偷逃跑，老百姓扶老攜幼的避難，以致整個社會

，立時陷於混亂的狀態，交通為之斷絕，金融為之枯竭，這樣的民族鬪爭，何能持久，何能倖免？要使人民能夠做到「戰時如平時，平時如戰時」，這又須文化界起來領導的一件最偉大的工作。

三 時局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關頭了，我們已往的錯誤，大可不必算賬了。歷史上的糊塗賬，大家都應該擔負一份，我們站在文化界思想界的最前線，固然應該督責政府，要牠加倍努力，要牠奮發有為，要牠獨立自信，要牠不屈不撓，要牠向敵抗戰，但我們文化界同人，在此期內，尤其要注意「向心力」之如何完成，要注意「離心力」之務去，要注意思想的一致，亦惟有思想的一致，方有組織的一致，行動的一致，抗戰的一致。

我們對於北平文化界的領導者，除表示十二萬分欽佩外，率貢芻獻，不知有補於民族之危亡否也。

西哲有言：鬪爭，鬪爭，你能鬪爭就算生存着了，我們希望全中國文化界，應該繼承平文化界之後，趕緊起來，向鬥爭大道，大步前進着。

二月三日於金陵

論中日關係之調整

馬博厂

日來中日外交關係調整之說，甚囂塵上，兩國憂時之士，無不盼其實現，然而自我國外交部長張岳軍氏與日本有吉大使一度會談以後，兩方外交人物，尙未能廣續正式之交涉。同時東京方面，廣田外相更明白宣稱其所提之三大原則，已由中國接受，且謂必以此三原則為交涉之根據，中日之關係，方有調整之希望；而中國方面，則謂廣田氏所提之三原則，並未經中國之認可，更無從以之為談判之基礎，至三原則之內容，所包既廣，意義亦極空泛，欲中國加以接受，不啻使中國失去其外交軍事及經濟之主權，以今日中國政府之立場言，無人願一亦無人敢負此重責，以簽訂任何包含此項原則之協定，而為誤國之罪人。

值茲兩國當局力謀調整相互關係之初，雙方發表之意見及希望，相去若是其遠，是中日邦交之前途，已呈暗淡之象，吾人殊不容絲毫樂觀也。

中日關係之調整，實為兩國互利之舉，無待贅言。就我國目前之地位言，內部已百孔千瘡，問題更極端繁重，舉國上下咸欲集其全力，以求民族國家基本問題之解決，固無力以與任何國家論「日之短長」，亦無暇以向其他民族

尋仇復恨。我國最誠懇最切實之需要，乃為十年二十年以至數十年之和平時間，蓋有較長時期之和平，方能充分利用政府及人民之力量，以謀民族之復甦，以完成國家之經濟建設，而此種民族更生之企圖，並非即以應付鄰邦為目的，因我國之復興問題，至艱且鉅，斷非短時間所可竣事，更難以最大之努力，造成一新興之國家，以與先進各列強相颉抗。反之，若鄰邦以平等互助之原則待我，尊重我之主權，贊助我之復興，則我國民族經濟文化建設成功之日，即鄰邦商務完滿發展之時。凡能以和平與友誼之手段，所造成之國際關係，自有其存在與維持之價值也。

日本今日之處境，不得謂之理想，且其終極之危險，或較大於中國，吾人從旁觀察，覺中日關係之調整，亦為有利於日本之建設。日本自毅然退出倫敦海縮會議以後，其在國際間之地位，顯然孤立，而其破壞國聯盟約，華盛頓九國公約，及巴黎非戰公約之行為，已引起全世界之怒視，此後再欲以其孤立之海軍，儘量擴充，並以此為侵略亞洲大陸及南洋羣島之工具，勢必引其太平洋沿岸其他各國之合作，以謀抵制，日本雖強，終不能暢所欲為。日本

於此孤立形勢之下，恃其海陸軍之強，以維持其自信之力，量，仍進行其固定之侵略政策，對內固可安定一時之人心，對外卻失去一鄰邦民族整個之友誼，造成四萬萬人心理中不可磨滅之仇恨，於日本之將來，未必有益。即使日本能以其優越之武力，以完成其帝國主義之迷夢，以中國問題之鉅，民族思想之濃厚，恐難立收統治中國美滿之效果；況列強環伺，爭求恢復或維持其既得之權利，未必即能任日本一國為所欲為也。

吾人既認中日關係之調整，為一切要且有利於兩國民族生存之企圖，則目前所應急需討論者，乃在調整之原則與方法問題而已。然此問題似複雜而實簡單，若日本此時能一改其近數年來所採取之方略，力求認識中國之立場，增進中國人民之友誼，在外交方面，應即恢復中日通常之交往關係，尊重兩國已定之條約，嚴守國際間應有之慣例

，在經濟貿易方面，應以和平合法的手段，取得中國之商場，進行投資之事業，則兩國人民，必能漸次言歸於好，以維持其優良關係。至目前最緊要之步驟，則在兩國當局，能以開誠相見，各將本國之立場，和盤托出，然後根據條約與公約，平心靜氣從事協商，盡力解決兩國間一切懸案，從此訂立一永久相互遵守之條約，以為過去關係之清算，再根據上述之原則，徐圖兩國人民感情之回復，則東亞和平之維繫，可以實現。吾人誠願日本能實行其向日之宣言：「不干涉中國之內政」、「無領土之野心」贊助「中國之自力更生」及「維持東亞和平」等語，以為調整中日關係之基礎，蓋必日本有決心，則此種轉變時代之外交工作，方有成功之希望，否則前途茫茫，中日之和平關係，固不可保，即世界之現狀，亦恐難以持久也。

本刊投稿簡則

(一) 本刊歡迎關於政治、外交、經濟、財政、教育

、建設，各種討論批評實際問題之外稿（以短
敘明暢為原則）。

(二) 投寄譯稿，須附原文，以資核對，稿末並須附

具原書卷頁（最好能將原著者歷史作一極簡要
之介紹）。

(三) 來稿務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四) 來稿須於姓名下加蓋圖章，書明通信地址。

(五) 來稿揭載後，酬本刊全年一份。

(六) 來稿概不退還，惟附有郵資預先聲明者例外。

(七) 來稿，本刊有增刪修改之權，如不願增刪修改
者，請先聲明。

(八) 來稿請直寄南京石鼓路一〇九號本社編輯部。

中外月刊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出版
第一卷 第二期

封面（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先生）

二三

中國動向

中樞政治之新趨勢

曹聖芬

中日問題與國際關係

錢震

太平洋風雲與日本

呂虹漢

新貨幣制度與輔幣的改革問題

儲玉坤

美國二位新聞教育家之長逝
司各脫與曼徹斯脫衛報

馬星野

新聞報

王歧堯

略談社會新聞

黎世芬

紀碩夫

世界展望

彭河清

國際聯盟的改組運動

邵德潤

法國經濟危機概況

馬志鏗

美國大選前之黨爭與政潮

趙炳烺

日本國體明徵運動的裏層

王漢中

德國國社黨的宣傳方法

黃壽朋

莫索里尼怎樣統制意大利

彭河清

世界展望

邵德潤

社址 南京建鄴路一七四號

價目 全(十冊)一元 每期一角二分

優待 二月底以前直接定閱者八折